

La Peste / L'Etranger

[法国]阿尔贝·加缪 著 顾方济 徐志仁 译
郭宏安

鼠疫局外人



A. CAMUS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La Peste / L'Etranger

[法国]阿尔贝·加缪 著 顾方济 徐志仁 译
郭宏安

鼠疫局外人



A. CAMUS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鼠疫;局外人 / (法) 加缪(Camus, A.) 著; 顾方济, 郭宏安等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2(2000. 2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La Peste; L'Etranger

ISBN 7-80567-731-X

I. ①鼠… ②局… II. ①加… ②顾… ③郭…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893 号

Copyright © 1942, 1947 by É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Édition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7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7-53, 55 号

- | | |
|--------|-----------------------------------|
| 书 名 | 鼠 疫 局外人 |
| 作 者 | [法国]阿尔贝·加缪 |
| 译 者 | 顾方济 郭宏安等译 |
| 责任编辑 | 韩沪麟 |
| 原文出版 | Editions Gallimard, 1974, 1962 |
| 出版发行 | 译林出版社 |
| E-mail | yilin@public1.ptt.js.cn |
| W W W | http://www.yilin.com |
| 地 址 |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
| 照 排 |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
| 印 刷 | 扬州印刷总厂 |
|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32 |
| 印 张 | 8.12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302 千 |
| 版 次 |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80567-731-X/1·425 |
| 定 价 | (普及本)9.00 元 |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鼠疫

关于加缪和他的《鼠疫》 林友梅 3

鼠疫 顾方济 徐志仁译 林友梅校 7

局外人

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

——谈谈加缪的《局外人》 郭宏安 201

局外人 郭宏安译 207

鼠 疫

关于加缪和他的《鼠疫》

林友梅

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抚养下,加缪在贫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罢工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共产党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法西斯撰写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加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曾轰动一时。1960年春,加缪乘坐伽里玛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鼠疫》这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发表)同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

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

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位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画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

——丹尼尔·笛福^①

故事的题材取自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在奥兰城发生的一些罕见的事情。以通常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太寻常的事情发生得颇不是地方。乍看起来,奥兰只不过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而已。

城市本身相当丑陋,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它的外表很平静,但要看出它在各方面都不同于很多商业城市,那就必须花费一些时间才行。怎么能使人想象出一座既无鸽子,又无树木,更无花园的城市?怎么能使人想象在那里,既看不到飞鸟展翅,又听不到树叶的沙沙声,总之这是一个毫无特点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只有观察天空才能看出季节的变化。只有那清新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的鲜花才带来春天的信息,这里的春天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夏天,烈日烤炙着过分干燥的房屋,使墙壁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人们如果不放下百叶窗就没法过日子。但到了秋天,却是大雨滂沱,下得满城都是泥浆。直到冬天来临,才出现晴朗的天气。

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在我们这座小城市中不知是否由于气候的缘故,这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那里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不过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特别感兴趣,用他们的话来说,最要紧的事是做生意。当然,他们也有一般的生活乐趣和享受,例如:喜欢女人,爱看电影和到海滨去沐浴。但是他们很有分寸,把这些娱乐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其他日子里则设法多赚些

^①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十八世纪名作家,著有《鲁滨孙飘流记》等。

钱。下午下班后，他们按时在咖啡馆相聚，在同一条林阴大道上散步或者呆在阳台上。年轻人喜欢寻找一些短暂而强烈的刺激，至于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的嗜好，则不外乎跑跑滚球俱乐部，参加联谊团体举行的宴会，或者上俱乐部去狂赌，碰碰牌运。

有人一定会说，这并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现象，我们的同时代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不错，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人们从早到晚地工作，而后却把业余生活的时间浪费在赌牌、上咖啡馆和闲聊上，这种情况，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有些城市和地方的人们却不时地在考虑一些其他的生活内容。虽然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可是能有这种考虑就比没有强。而奥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一座十足的现代城市，也就是说，那里的人们除了日常生活外是不考虑什么其他事情的。因此，没有必要确切地描绘我们这里的人们的恋爱方式。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不是短暂地纵欲狂欢一番，就是安于长期的夫妇生活。除这两个极端之外，很少有中间状态。这也不是他们所独创的。奥兰跟别处一样，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本城比较独特的地方是死亡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好，还是说难受比较恰当。生病总是不舒适的，但是在有些城市和地方，你如生了病就会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听其自然。一个病人需要人们的体贴，要有扶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奥兰，为了适应严酷的气候、大量的生意经、枯燥无味的景色、短促的黄昏、娱乐的方式等等，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生病的人在哪里都感到孤寂，更何况是垂死的人。试想当全城的人都忙于在电话中或在咖啡馆里谈着票据呀、提货单呀、贴现呀等等的同时，一个关闭在被烈日烤得劈啪作响的重重墙头后面的垂死病人该是什么境况？人们可以想象，即使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在一个干热的地方，当死神来临时将会带来何等难受的滋味！

这番情况介绍也许能使人对该城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虽然如此，这一切毕竟不该过分子以夸张。值得提出的是该城的市容和生活一样平庸。但是一旦过惯了也不难打发日子。既然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是不难习惯的，因此可以说一切都还过得去。当然，这样看来，这个城市的生活的确不太有情趣。不过，这里至少没有发生过什么混乱，本城居民的坦率、友好和勤劳常常赢得外来游客的理所当然的好评。这个没有景色、没有草木和没有灵魂的城市却给人们一种宁静的感觉，最后会把

人带入梦乡。可是,应该说句公正话,该城四周风景之美倒是无与伦比的,它处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原中间,周围是阳光照耀着的丘陵,前面是一个轮廓完美无缺的海湾。令人遗憾的只是城市是背着海湾建造的,因此如果不走上一段路是看不到海的。

知道了上述这些情况,就不难相信,这个城里的居民是根本不会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那些小事件——我们下面会看到——是此后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先兆,而这一连串的事件也就是本书要报道的内容。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简直不可置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写报道的人是不能考虑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只是:当他知道某件事确已发生,而且这件事已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死,因而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时他就说:“这件事发生了。”

再者,这件事的叙述者——到时候读者就会对他有所了解——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而且当时的形势使他本人也卷入了他要叙述的事情中去,否则他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充当史学家的角色。不用说,一个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拥有一定的资料的。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者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能收集这篇报道中所有人物向他倾诉的心里话;最后还有终于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资料。他可以在自己认为需要时加以引证和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他还可以……然而这段开场白和哗众取宠的话也许该到此为止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有关下述这件事的头几天的经过,还得说得详细些才行。

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踢开了这只小动物，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看门人米歇尔老头儿的反应，更使他感到这个发现不寻常。出现这只死老鼠，对他说来只是有点奇怪而已，但在看门人看来，简直是一件荒唐事。他断言这幢楼房里根本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在二楼的楼梯口确实发现一只老鼠，而且可能是死老鼠。但这也白说，米歇尔丝毫不动摇：楼房里没有老鼠，这一只一定是人家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当晚，贝尔纳·里厄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打算上楼回家，忽然看见一只全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它停了一下，像是要稳住身子，然后向医生跑过来，接着又停下来在原地打转，同时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最后半张着嘴，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医生细看了一会儿就上楼了。

他当时想的并不是老鼠，只是这口鲜血勾起了他的心事。他那病了已有一年的妻子明天就要到山区疗养所去。他一回家就看见她按照他的吩咐在卧室里躺着，这是为了应付旅途劳顿，预先做的准备。她微笑着说：“我觉得很好。”

医生在床头灯的亮光下注视着她转过来向着他的脸庞。尽管她已有三十岁了，又是带有病容，但在里厄看来，她的脸始终同她少女时一样。大概是这一微笑使其他不足之处都消失了。

“能睡就睡吧，护士十一点钟来，我陪你们上十二点钟的火车。”

说完，他吻了一下她那有点湿润的前额。她带着微笑，目送他到房门口。

第二天，也即四月十七日，八点钟，看门人在医生经过时拦住了他，责怪那些恶作剧者又在过道中放了三只死老鼠。这些老鼠大概是用大型诱捕器捕获的，因为它们浑身是血。看门人拎着死老鼠的脚，在门槛上已站了一些时候，想等有人来时说些挖苦话，从而使那些恶作剧者自我暴露。然而并无下文。

“好啊，这些坏家伙，”米歇尔说，“我终究会把他们抓住的！”

里厄觉得迷惑不解，他决定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开始他的出诊，他最穷的病人都住在那里。在那些区里的垃圾清除工作要比别处晚得多，汽车沿着那里的尘土飞扬、笔直的道路行驶时，掠过一些放在人行道旁的废物箱。在一条街上医生数了一数，丢弃在菜皮和破布堆里的死老鼠大约有十二只。

第一个病人住在一间沿街的房子中，吃饭睡觉都在这间房里。床上躺着病人。他是个面孔铁板、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两满锅鹰嘴豆放在他面前。病人原来坐在床上，医生进来时，他把身子往后一仰，想喘口气，重又发出那老哮喘病人的尖声哮喘。他老婆拿来一只面盆。

医生在为他打针时，他说：“嗯，医生，它们出来了，您见到了吗？”

他老婆接口说：“不错，隔壁人家捡到了三只。”

老头儿搓搓手又说：“它们走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有，是饿坏了哪！”

里厄接着注意到全区的居民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完毕，他就回家了。

米歇尔告诉他：“有您一份电报在楼上。”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别的老鼠。

“噢，没有，”看门人回答说，“你知道，我守在这里，量这些畜生也不敢来。”

里厄从电报中得知，他母亲将于明天来到。她是因儿媳要离家养病，所以来为儿子照料家务的。医生走进屋子，护士已到了。里厄看见他的妻子站着，穿着一色的上衣和裙子，已经梳妆打扮过了。他微笑着对她说：

“这样好，很好。”

过了不久，他们到了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

她注视了一下车厢说：

“这对我们来说，太花费了，对吗？”

“需要这样，”里厄说。

“关于这些老鼠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事很奇怪，但是会过去的。”

他接着急速地对她说，请她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的，但却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叫他不要再往下说了。但是，他又说：

“你回来时，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她的眼睛闪着光，说道：“对，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看窗外。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你推我搡。火车的排汽声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叫了一下妻子的名字，她回过身来，他见到她脸上挂满着眼泪。

他轻声地说：“不要这样。”

她含着泪，重又露出笑容，但笑得有点儿勉强。她深深地透了口气说道：

“去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他紧紧地抱住了她。回到月台上，透过玻璃窗，他看到的只是她的微笑。

“得好好保重啊！”他说。

但是她已听不见了。

里厄走近月台的出口处，迎面碰到了预审推事奥东先生，手搀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否出门去。奥东先生是个高个儿，黑头发，相貌一半像过去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一半像一个阴郁的运尸人。他用和蔼的声音简短地答道：

“我在等我的夫人，她是专程去探望我家属的。”

火车鸣笛了。

推事说：“老鼠……”

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注意了一下，但又回过头来向着出口处，说：

“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时候，唯一使他不能忘记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打那儿经过，膀子下挟着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箱子。

同一天下午，门诊一开始，里厄接见了一位青年人，据人家告诉他，这人是新闻记者，早上已经来过。他叫雷蒙·朗贝尔。这是一个身材不高，宽肩膀，神色果断，双目明亮而聪明的人。朗贝尔身穿运动衣式样的服装，看来生活宽裕。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他是受巴黎的一家著名报纸的委托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的，要找些关于他们卫生条件的资料。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条件并不好。但是在进一步谈论之前，他想知道，记者是否能据实报道。

“当然，”对方说。

“我是说您能全面地对这种情况进行谴责吗？”

“全面？说实话，不能。不过我想这样的谴责可能是没有根据的。”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这样的谴责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只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是否能做到坦率而毫无保留。

“我只能接受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不能提供资料支持您的见证。”

“您的话简直同圣茹斯特^①如出一辙，”新闻记者微笑着说。

里厄继续用平静的语调说，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他讲的是一个对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但他喜爱他的同类，因此，就他本人来说，决不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迁就。朗贝尔缩着脖子瞧着医生。

“我想我理解您的话，”最后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医生送他到门口说：

“谢谢您能这样看待问题。”

朗贝尔显得不耐烦地说：

“好，我懂得，请原谅我打扰您。”

医生同他握手，告诉他此刻市内发现大量死老鼠，关于这件事，可能有不寻常的报道可写。

“哦！”朗贝尔叫了起来，“这事我感兴趣。”

下午五时，医生正要为另一些病家出诊，在楼梯上同一个年纪还比较轻的人擦肩而过，此人外形厚实，肥头大耳，凹陷的脸上，横着两条浓密的眉毛。在住这幢楼房最高一层的那些西班牙舞蹈家的家里，他曾经见过这个人几次。这人名叫让·塔鲁，他站在梯级上，一本正经地吸着香烟，一边注视着脚旁一只快要死去的老鼠在作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来，灰色的眼睛冷静地盯住医生，向他打了一个招呼，接着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奇怪的事情。

里厄说：“不错，可是这件事到头来会令人厌恶的。”

“不全是这种看法，医生，只是从某一个方面看是这样。我们不过是从未见过类似的事罢了。但是我对这事感兴趣，不错，实在感兴趣。”

塔鲁用手向后掠了掠头发，重新观察那只老鼠，这会儿，它已不动了。他向里厄笑道：

“总之，医生，这主要是看门人的事情。”

医生正好看见看门人在楼房前面，背靠着门口附近的墙上，他那平

^① 圣茹斯特(176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